



●良 心

機工文化打卡地(上)

生命凋零，但歷史並未遠去。越來越多的人走近南僑機工，特別是南僑機工的後輩們，成為了搶救挖掘、收集整理和研究南僑機工史料的急先鋒和主力軍。昆明是滇緬公路的起點，也是南僑機工回國抗戰的聚集地和訓練營，南僑機工在昆明留下的歷史文化最為豐厚。近些年來，昆明不僅是南僑機工歷史文化的研究展示中心，同時也成為了南僑機工後輩們的聚集活動中心。

昆明主城區五華區大觀街道的新聞里社區，是當年大部分南僑機工居住過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兩位機工是羅開瑚和唐國常。羅開瑚於2020年11月12日凌晨2點在新聞里社區去世，是雲南最後一位逝世的南僑機工，享年102歲。羅開瑚1918年7月15日生於海南文昌市重興鎮甘村鄉鯉塘村，自幼家境貧寒。16歲時，父親去世，家裏失去了經濟來源。這一年，他為了家庭生計和償還債務，到馬來西亞謀生。當時花100多大洋，三天就能到新加坡，但是他的錢不夠，只能繞路從香港走，坐了半個月的輪船才到達新加坡，而後又輾轉馬來西亞的太平埠，找到開酒店的叔叔。在叔叔的酒店當了兩年洗碗工，勤儉的他攢下不少積蓄，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馬來西亞華僑在當地掀起了愛國主義狂潮，成立了各種募賑會組織，在華僑中募集抗日救國物資。羅開瑚僑居地滿大街的條幅、募捐箱，漫天飛舞的帽子和激昂的口號。他於1939年7月在馬來西亞報名加入第八批南僑機工服務團回國參戰。到了昆明，羅開瑚在潘家灣接受短暫訓練後編入華僑先鋒第一大隊第二中隊任班長，奉命執行從緬甸臘戍到中國畹町地段的運輸任務。華僑先鋒大隊，全是華僑技工及司機組成的車隊，車輛也是國外愛國華僑捐款購買送回國的。大隊駐在滇西的遮放、芒市一帶，這裏時常瘧疾流行，每天都有因病死亡的危險。據羅開瑚回憶，當時的滇緬公路路況十分糟糕，車輛行駛

途中拋了錨，要等派車來搶修，有時要在車上挨餓受凍一兩天之久。加之頭頂敵軍的轟炸機，他的不少老鄉不幸翻下山崖，車毀人亡。惠通橋和功果橋被敵機炸斷了數次，司機總是停車於公路上挨餓，等待工人搶修公路及用汽油桶造臨時浮橋通過。

1942年機工隊被遣散後，羅開瑚在昆明先後當過小飯店會計、陽宗海美軍招待所洗碗工，還做過土特產生意及其他小買賣。後來在朋友的介紹下，到大理做起鹽生意，在下關當鹽庫保管員時與一位女教師喜結良緣，做了當地人的「上門女婿」，也因為這樣他錯過了1948年最後一架接他們返回印尼的飛機。新中國成立後，羅開瑚被安排到昆明五金公司工作，直到1978年退休。

羅開瑚退休後住在昆明新聞里社區篆塘路96號紅磚小院裏，喜歡養花、習字、運動、讀書報。他一直保持着在南洋生活時養成的習慣，每天都要沖泡咖啡或者紅茶。他每天的生活十分規律，7點鐘起床、洗漱，整理完屋子後，泡上一杯咖啡，翻看當日《參考消息》，開始了一天的悠閒生活。羅開瑚於1985年開始聯繫、尋找南僑機工戰友，還擔任南僑機工雲南聯誼會理事。他經常出席新聞里社區歸僑僑眷們的聯誼活動，還不時出席一些紀念滇西抗戰勝利的活動，樂意接受記者們的訪問。他常常為自己曾身為南僑機工而感到自豪：「身穿綠色卡其布軍裝、船形帽、圓領章，領章左為《西南》字樣，一副準軍事機構的打扮，駕車奔馳在滇緬公路上，為抗日前線將士搶運軍用物資。」

在昆明新聞里社區，除羅開瑚外，還曾住着南僑機工唐國常。唐國常祖籍雲南，1919年出生在緬甸。1939年，年僅20歲的唐國常在做修電器的活計，得知招募機工的消息後，毫不猶豫報了名。隨後考入廣州司機訓練所，學習一段時間駕駛後，被派往昆明，編入西南運輸處第一大隊任司機。唐國常開着卡車滿載軍火



●居住昆明新聞里社區的南僑機工羅開瑚。

作者供圖

等物資往來於仰光、臘戍、畹町、保山和昆明。當時車隊經常跑保山、惠通橋和龍陵，那段路山高路窄，相當難走，一路上都可以看到車毀人亡的場景。

有一段時間，國軍要組織長沙會戰，前線急需坦克、大炮，唐國常和機工們運坦克時，將一輛坦克拆解，用三輛卡車運送，從臘戍出發，沿滇緬公路到昆明，再輾轉到貴州，一直拉到長沙，沿途兩三千公里，一刻也不能停歇，一趟需20多天，有些機工餓死累死在路上。抗戰勝利後，唐國常在昆明成了家，但沒有工作。為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用積存的錢買了一輛舊車，幫別人拉貨。1953年，公私合營，他在昆明運輸總站幹了2年後，1956年被分到臨滄運輸總站，到1976年退休。2014年10月3日，95歲的他安詳辭世。直到臨終時，唐國常都記得他當年在滇緬公路開的美國進口車的車牌號為「1412」。

羅開瑚和唐國常兩位南僑機工的英雄事跡，令新聞里社區中外聞名。南僑機工的愛國情懷，賦予了新聞里社區厚重而獨特的街區文化。為了紀念南僑機工們為抗日戰爭勝利作出的巨大犧牲和貢獻，為了永遠記住這段不可磨滅的歷史，進一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從2015年開始，新聞里社區以轄區內羅開瑚、唐國常兩位南僑機工的愛國先進事跡為背景，精心建設南僑機工歷史文化社區。在社區和街道先後建立了南僑機工陳列室和各種形式的紀念展示，以展板、展品、實物等再現了80多年前3,200多名機工告別南洋、歸國抗戰的歷史以及各個時期愛國華僑的愛國事跡。新聞里社區已成為全國唯一以抗戰歷史為主題的南僑機工歷史文化社區和宣傳南僑機工歷史文化的重要打卡地。



●趙素仲

從诗经時代吃到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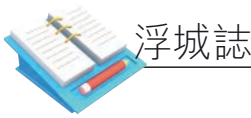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五十五 始為奉禮憶昌谷山居（節選）

——李賀（唐代）



李賀 始為奉禮憶昌谷山居
長槍江水熟，小樹梨花春。
土甌封茶葉，山杯鎖竹根。
不知船上月，誰權滿溪雲？
己亥夏月 素仲配畫



●羅大伦

故鄉的大石磨

在故鄉牟河壩，有一樣東西如同歲月的印記，深深地烙在我記憶的腦海裏，那便是大石磨。過去的歲月，它靜靜地躺在牟河壩的磨坊裏，承載着過往的時光與心酸的故事。

磨坊位於牟河下游的堤壩邊，一間小小的木質磚瓦房裏，安放着一架石磨和一架打米機，以及一些裝麵和裝米的籬筐。石磨由兩塊又圓又厚的青石製成，上面那塊有齒，下面那塊有凹槽，石磨下面是橢圓形的磨盤，磨盤下面是磨架，磨架下面是水池。磨坊看管員把穀物放進石磨的洞口，然後抽開牟河水的閘門，河水嘩嘩流進水池，水池裏灌滿水後，再抽開水池的閘門，水池裏的水形成一個巨大的漩渦，沖得石磨不停地旋轉，然後從洞口流到下面的河流。大石磨轉動起來的聲音吱吱呀呀的，像是在唱一首古老的歌謠，迴盪在磨坊，也迴盪在我童年的歲月。

悠悠轉動的石磨，磨出的麵粉又白又細，還帶着泥土的清香。石磨不知誕生於什麼時候，表面已被歲月打磨得光滑無比。除了石磨，磨坊裏還有一架水沖打米機，也是用水池的水沖轉打米的。小時候我去磨坊裏玩過，看到閘門一開，吱吱呀呀的磨麵聲、咕嚕咕嚕的打米聲混合在一起，那是鄉村裏最動聽的旋律。

那時候的鄉村還沒有電動磨麵機和電動打米機，牟河壩的磨坊成為方圓十里鄉親打米磨麵的聚集地。農忙季節，他們揹着穀物從十里八里以外趕來打米磨麵。河水漲滿時，石磨和打米機可以同時使用，河水不多時，只能使用其中一件。有時大石磨和打米機轉着轉着，忽然停下不轉，打米機的帶子也滑落下來。原來是牟河的河水不夠，無法沖轉它們。前來打米磨麵的人們只好把玉米、麥子和稻穀放在磨坊裏，等河水漲滿時再來。磨坊是生產隊的，磨麵打米按斤兩收取工錢，價格由生產隊決定。收來的工錢全部上交給生產隊，生產隊按收入的多少給看管員記工分。大哥曾經當過磨坊的看管員。有次石磨的齒輪鈍了，為了多掙工分，20來歲的大哥和另外一個中年人把石磨抬下來維修，從此年輕的大哥傷了氣血，得了肺癆，早早地離開了人世。大哥去世後，每次從河邊走過，聽到吱吱呀呀的石磨聲和咕嚕咕嚕的打米聲，我覺得那是大哥的在天之靈在喂喂地哭訴。從此很少去磨坊玩耍，直至磨坊被現代化的打米磨麵工具所淘汰，棄置在那裏。

如今，我已離開牟河壩32年。想起故鄉的時候，我就想起那兩扇大石磨。它們是我心中的痛，也是我對童年時光的懷念。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敦煌歷史中的一次土地紛爭：阿龍的故事

在敦煌的歷史中，文獻記載着一則近千年前的土地官司，主角是一位名叫阿龍的寡婦。這個故事之所以引人關注，不僅因為它展現了古代中國社會的一次法律判決，還因為在藏經洞出土的近7萬多件文書中，完整記錄了這場訴訟的諸多細節，讓我們得以一窺當時真實的社會生活。

阿龍的一生充滿坎坷。她早年喪夫，唯一的兒子因犯罪被流放至瓜州，不久病逝。此後，阿龍獨自撫養年幼的孫子，她年邁體弱，無法從事繁重的農耕勞動，又失去了本應屬於丈夫、兒子的土地，生活逐漸陷入困境。

為了生計，她執意要回已經故去丈夫的土地，背後有着複雜曲折的故事。當年，她的丈夫和兒子名下共有32畝土地。丈夫去世後，兒子又遭流放，阿龍無力耕種，便將土地租給了親戚索懷義。索懷義並非長期駐守此地，他常因生意或放牧外出。

彼時，敦煌周邊的貿易繁榮，但局勢並不穩定。青海地區的吐谷渾部落因糧食和物資短缺，時常襲擾周邊，擄掠人口充實部落。索家族中有個名叫索進君的男孩，便在一次衝突中被擄至青海，成為吐谷渾的一員。

多年後，索進君得知自己故鄉在敦煌，便偷偷牽走部落的兩匹馬，歷經艱險逃回，並將馬匹獻給敦煌官府，以示歸順。在當時，馬匹是極為珍貴的戰略物資。敦煌官府念其「獻馬有功」，又考慮到索懷義外出、阿龍家的土地無人耕種，便從中劃出22畝土

地，正式賜予索進君。

然而，索進君自幼習慣了遊牧生活，對農耕的辛勞難以適應。不到幾個月，他便厭倦了日復一日的勞作，索性離開敦煌，重新投身草原生活。

索進君離開後，索家的另一個人——索佛奴——趁機佔據了這塊土地。他與索進君之間或許有某種協議，總之，他順勢成了新的地主。

這片土地，阿龍原本並未急於收回。一方面，丈夫早逝，她在家族中失去了靠山；另一方面，兒子犯罪流放，她心中有愧，不願主動提起。然而，隨着兒子的去世，生活的重壓讓她無路可退。當她發現索佛奴佔據了自家土地，最終鼓起勇氣向敦煌官府遞交狀紙，為自己和孫子爭取生存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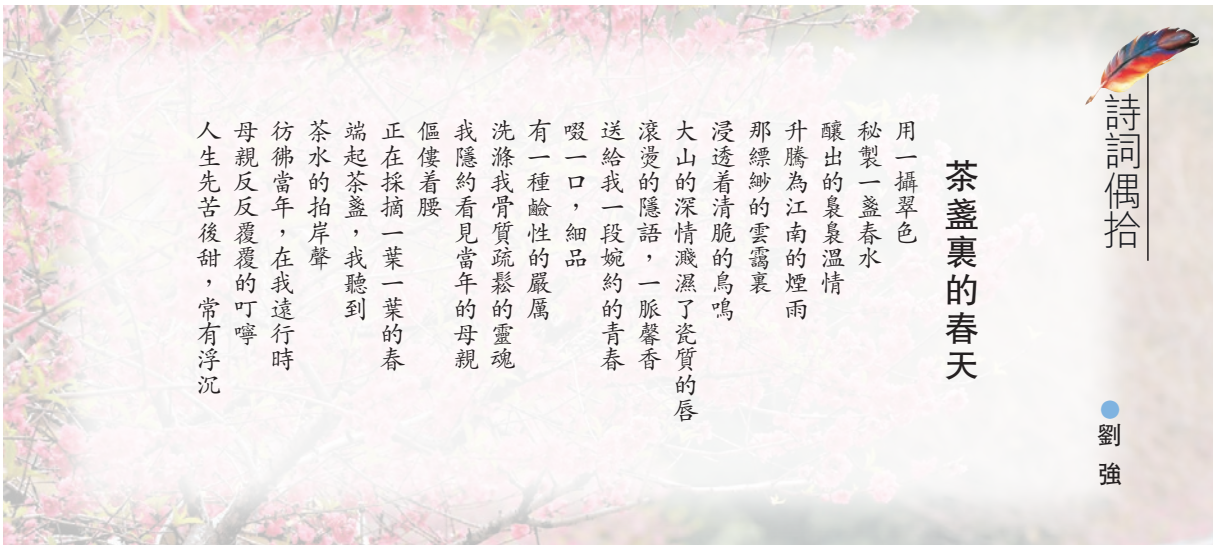
當時，敦煌的最高長官是曹元忠，人稱「曹大王」。此案遞交後，官府僅用了五天便做出了一項巧妙的判決：土地所有權仍歸索進君，但鑒於他已離開，耕種權和經營權歸阿龍及其孫子所有，土地上的收益自然也歸阿龍。這一判決既維護了敦煌官府法律的權威和延續，又照顧了阿龍的生活困境，使得這場糾紛得以圓滿解決。

在浩如煙海的歷史記載中，這一事件或許微不足道，猶如鳴沙山上的一粒細沙。但因相關卷宗的保存，它得以被後人發現，成為研究古代社會經濟、法律及民生的重要素材。從這則故事中，我們得以窺見彼時敦煌的社會風貌，感受到千年前人們在時代變遷中的苦難與堅強。



●阿龍文書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作者供圖



詩詞偶拾

茶盞裏的春天

●劉強